

比较视野下的教师教育

——专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

黄菊^{1,2}

(1.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2. 温莎大学 教育学院,温莎 加拿大 N9B 3P4)

摘要:许美德教授运用比较教育之镜透视中国教育,分析中西教育文明的互学互鉴,探索从“文明对话”的视角建立全球教育关系新途径。从批判价值中立的研究,转向价值明确的比较教育研究法框架,探究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因素,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追溯“师范”一词的含义,强调它是东方和西方的一个桥梁,中国的教师教育必须有效地结合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师范教育的传统,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

关键词:比较教育;文明对话;教师教育;许美德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5)05-0054-08

许美德教授是当今国际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和汉学家,也是最负盛名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专家之一,曾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首席参赞(1989—1991)、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系主任、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国际比较教育学会理事长等职。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专业教授。

2015年5月9日到5月13日,许美德教授应邀参加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加拿大-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①第二届年会,在会议期间笔者对许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许美德教授的学术经历与教育研究

笔者:许美德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是一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汉学家和著名的比较教育研究专家,您是从何时开始接触比较教育学的呢?

许美德:我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二战投降的那天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沿海的一个海军基地,我的父亲是一名加拿大海军。我成长于加拿大最多元化的城市多伦多,本科在多伦多大学古典文学系(Class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学习,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受古典文学的影响,我对中国的文字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67年,我本科毕业后,经父母的同意,借探望亲戚(一位亲戚是传教士,在香港创办了一所小学)的机会来到了香港,并到圣公会的一所中学任中学教师,主要担任英语、历史、宗教等课程的教学。当时的香港还很穷,但香港人士很友

^① 该项目为期7年,已获得加拿大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SSHR)300多万加元的资助。该项目由加拿大温莎大学教育学院许世静教授和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康纳利教授共同主持。

收稿日期:2015-07-07

作者简介:黄菊,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加拿大温莎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加拿大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合作项目“加拿大-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项目”(895-2012-1011),项目负责人:许世静,迈克尔·康纳利。

善、勤奋,使我渐渐产生出一种中国情愫,我便留在那里从事了 11 年的中学教学。到香港后,我便开始学习粤语,达到了能够流利听说读写的程度。随后,我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及其相关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1974 年至 1975 年期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普通话。

我明白要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一定要进入中国内地。我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逝世那一天,由于这个消息冲击力太大了,人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后来,正如大家所见,邓小平主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我预感到中国即将发生激动人心的变化,也意识到如果想要在中国工作和参与建设,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学历。1978 年 9 月,我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继续深造,师从布莱恩·霍尔姆斯(Brian Holmes)教授学习比较教育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我继续在霍氏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关注 20 世纪中国大学与西方的学术关系和交流经验。

笔者:您还是一位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特别是您从比较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方面的著作。您是如何和中国高等教育结缘的?

许美德:1980 年,怀着对中国的热爱,我申请到中国工作,并于 1980 年 2 月至 1982 年 3 月,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到复旦大学任教,同时收集有关博士论文的资料。我当时就决定了未来研究的两大使命。一是研究一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一百多年来中国引进西方的模式,但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比如中国向前苏联学习,但后来又与前苏联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因此,中西方政治经济的交流,一定存在着文化差异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分析、反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历史中学习和了解过去的冲突,把与西方交流中的不当之处指出来,并探讨外来的文化教育与中国相结合。二是研究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它培养了很多有价值的人和事,并且影响到了欧洲。比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早在 16 世纪已经到达中国,他惊叹于中国的儒家文明,盛赞中国科举制度。利玛窦一生著述丰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具有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中国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宝贵的经验。

1984 年我回到加拿大,在大多伦多的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做博士后。正好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与中国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发展协议,以对中国高等教育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准备给中国的大学提供 12 项大额贷款^[1],帮助其恢复和重建硬件设备。作为唯一的既了解中国,又能用中文流利交流的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的学者,我很有幸参与到这两个项目之中。“文革”浩劫结束后,中国亟待重振研究生教育,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主要是支持中国建立新学科和培养年轻学者,我们带头帮助中国的重点师范大学开发教育学博士课程。最早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的李秉德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王奉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鲁洁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佛年教授,以及西南师范大学的张敷荣教授等。1989 年 4 月,由我主持设计的“加中联合培养教育学博士”(1989—1995)计划最终入选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重大项目,在 1989 年至 1995 年的时间里,我们获得了 40 万加元的经费资助^[1]。当时我们就考虑,在帮助中国高等教育与加拿大的合作发展中,让双方能够慢慢地了解,而不是很快地接受新的模式。该项目的成果之一便是联合培养了优秀的博士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如西北师范大学王嘉毅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强海燕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西南大学刘义兵教授等,这些人后来很多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中国教育领域的中坚人物。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时代里,更多西方国家看到中国发展的广阔前景,愿意支持中国更多地了解国际高等教育,以更好地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笔者:您对教师教育也很关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教师教育的?

许美德:我早在 1977 年就在香港大学拿到了教师资格证(Certificate of Education)。1989—1991 年,我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教育、科学与文化处任首席参赞,负责中加教育和学术交流,后来

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担任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1994年香港教育学院建立,1997年搬入新校舍,学校环境非常漂亮,办学经费也很充足,但学校的发展水平亟待提高,这是因为香港教育学院的师范教育特征,二是由于香港过去注重经济发展而一直都不太重视师范教育。随着教育发展的需要,香港开始重视教师培养。1997年经过反复考虑和家人的支持,我回到了年轻时生活过的香港,受聘担任香港教育学院校长,一直到2002年3月。因此,我开始关注和研究师范教育,结合西方和中国的师范教育的经验,思考如何办好香港教育学院,更好地培养香港中小学教师。比如,教师培养不仅要关注其学术水平、教育方面的实践训练,而且还要有热爱香港孩子的情感。可以说,后来对教师教育研究的关注,同我在香港教育学院的经历直接相关。

二、比较教育方法论与比较教育研究

笔者:作为一位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您对比较教育有何看法?

许美德:比较教育给了我一整套方法和理论体系以便对中国和西方的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我的比较教育观首先受我的导师霍尔姆斯教授的影响。霍尔姆斯认为比较教育是后实证主义(post positivism)的科学。他接受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假设-演绎法中的证“伪”假设的主张。在杜威反思性思维理论和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以及对前人思想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在比较教育方法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也很喜欢他提出的问题法(problem approach)。

霍尔姆斯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这对于比较教育研究是颇有益处的。他觉得在教育的发展中,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很快,而文化的变化比较慢,因此,如果能抓住每个教育文明核心理念,便可以预料未来。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开始思考如何抓住中国几千年的高等教育学术传统的核心概念,以及德国、法国、前苏联和美国四个国家的大学的核心概念。为什么是这四个国家呢?因为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家们大多效仿法国和德国的大学模式,从20年代开始美国模式很重要,而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的模式也很重要。我的博士论文《德国、法国、前苏联和美国的大学模式以及对1911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评价》(German, French, Soviet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Models and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ince 1911)分析了20世纪中国大学变革中的东西方冲突,以复旦大学为案例进行研究,既有宏观的运用比较教育方法论进行的研究,也有微观的研究,例如我曾访问过一些前辈,包括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的孙女马玉章女士。

比较教育研究是一种跨社会、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也是很好的进行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就比较教育而言,它是宏观的社会学研究,其主要概念也与社会学相关。比如前面提到的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就是有力的社会学分析工具。我借用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总括了每一种教育文明的核心概念,解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世界的重要价值。但是我觉得霍尔姆斯还是受二元论影响,认为价值中立原则是一条基本原则。我在给CIDA^①项目做评估计划的咨询中,开始反思价值中立问题,以前在霍尔姆斯门下学会的方法也因此产生了新的维度。一批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发起的“世界秩序模式计划”(World Order Models Project)深深影响了我,比如挪威学者约翰·高尔通等教授的一系列旨在展望全球社会美好未来的概念。我开始批判中立客观的研究,转向价值明确(value explicit)的研究。依据这种价值明确的比较教育研究法框架,我考虑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因素,尝试为中西方关系的理想化勾勒出一个基本框架,强调中

^①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西方的交往应该体现平等、自治、团结和参与等原则^[1]。

笔者:您在研究中国教育时,常常从国际视野出发,您是如何运用比较教育方法论开展比较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的?

许美德:我后来进行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师范教育研究,主要是运用比较教育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的框架内进行。我通过比较教育理论分析中西教育文明的互学互鉴,因为比较教育研究可以从不同文明背景思考教育改革的路径。此外,教育不能简单地移植,还涉及文化教育传统和发展的现实背景。因此,了解了教育发展的背景对于教育交流、借鉴非常重要。

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很多元,可以用不同的理论框架,比如叙事学(narrative)、人种学(ethnography)、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等。我不愿意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介绍中国的大学,比如我一直在有兴致地尝试将社会学的方法引入比较教育研究,希望为中国的大学和教育家们做一个肖像,让大家学习中国大学的精神,不单单从西方大学的概念来了解中国的大学。我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一书以及后来我的另一本书《21世纪中国大学的肖像: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就用了叙事的方法。《21世纪中国大学的肖像: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西南大学。1987年,我和法国著名汉学家巴斯蒂(Marianne Bastid)合作《中外比较教育史》(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一书。我们以依附论为框架看西方不同的教育模式如何在20世纪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以及教育文化的影响是否符合依附论。依附论认为教育和经济是结合起来的,教育为帝国主义服务。比如有人以为,传教士是为了巩固国家的侵略,而我昨天在大会的发言“Whole person Education through Reciprocal Learning: Three Historical Encounters”^①所说的传教士利玛窦,为传播中国的文化尽心尽力,对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理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分析中,我们可以用波普尔的“证伪”的方法。证伪即找到事实和理论假设不符合的地方。比如拉丁美洲受外国教育的影响,巩固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是不是所有都是。我可以把中国和拉美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比较,看中国的情况有没有可以“证伪”的地方。

从方法论而言,我用叙事的方法作的比较教育是从下到上,而不是从理论开始的从上至下,但我深知理论的重要,我的《理想类型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个人反思》^[2](The Use of Ideal Typ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 Personal Reflection)一文便体现了我对理论的探索历程。比较教育中有很多西方的理念是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的,放在东方不一定合适。比如教育领导中的很多概念在东方是否可以用?我认为可以用,但要用证伪的方式来用。因为证明中很多要素达不到,所以我们要证“伪”而不是证“明”。证“明”是实证主义,证“伪”是后实证主义的。“伪”的那边很有意思,为什么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看中国的情况有的地方会不符合呢?所以,这就是比较教育的魅力所在,我用它的理论框架,但是我不会证“明”,而是证“伪”。

90年代初,赛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发表了《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提出了“文明冲突论”^[3]。而我感觉不应该是文明冲突,而应该是文明对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需要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西方的教育家应该了解其他的文明,以及其他文明对历史文化的贡献,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希望东西方学者可以达成富有成效的对话。所以,我比较关注跨文化和多元文化。1992年,我和同事在多伦多组织了“跨文化知识:东西方大学与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目标是由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这三个主要东方文明国

① 本文系许美德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加拿大-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第二届年会的会前会议主题发言。

家在科学和社会知识领域的高级学者,共同思考这些文明对现代发展的贡献以及它们对欧洲启蒙运动与两方文明的影响和挑战。会议的论文集第二版《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一书于2003年出版^[4]。在我的建议下,1994年5月我们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湖南岳麓书院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学术会议“东西方知识对话与高等教育”,当时的主题是“携手构建跨大陆、跨文化的共同体”^[5],讨论西方如何向中国学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

1997年我到香港教育学院任校长,尽管工作非常繁忙,我仍开始考虑如何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介绍到西方,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一书,撰写了包括李秉德、鲁洁、叶澜、刘佛年、顾明远等中国现代教育家的故事。后来我又专门研究中国大学的案例,出版了《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Chinese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让西方了解中国大学的精神。我希望通过中国大学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精神介绍给世界,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介绍到西方,打开西方世界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窗口,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使中国大学和儒家文化在文明对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6]。

从中国的角度看,必须在深入了解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再考虑借鉴国外合适的模式,并把它和自身传统有效地结合。总的来说,美国的高等教育的传统和理念比欧洲大陆和前苏联更能和中国结合。因为美国的知识论是实用主义的,它是解决问题的,理论一定要联系实践;而欧洲的是抽象的理性主义模式。虽然美国和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但是从知识论而言,两者有统一的地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要小得多。

三、教师专业化与教师培养模式

笔者:西方国家在教师专业化上走得比较早,从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您对教师专业化和教师培养的模式如何看待呢?

许美德: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很好的进行比较研究的题目。教师最基本的素养是教师自我对知识的追求,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有新的追求,并用其自身的追求和学习影响学生。另外一点,教师应该非常热爱儿童、关心学生,因此应该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学,了解儿童,了解学生发展的过程,尊重不同学生的多样化追求。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关注教师专业化。教师行业与医学、法律行业一样,具有独特的专业性,有自己的行业标准。从世界局势看,教师的专业化应该由专门的独立机构来负责,它们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一种相互制约和促进的关系。是否建立独立的专业性机构来确定教师的专业化标准、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和促进教师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有安大略省教师学院(Ontario College of Teachers, OCT)和大不列颠省教师学院(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of Teachers, BCCT)等独立、专业的机构来负责审核评估教师专业。比如多伦多大学的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的教育学学士项目需要教师学院的审核,政府也要尊重这个学院的审核决定。中国以及很多亚洲国家的国情与加拿大不一样,其政府和教育的关系历来都比西方更密切。这种情况下,是否有独立的专业机构来做教师专业发展评估值得研究。但是东南亚也有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家有类似于教师学院,负责教师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的机构。

笔者: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培养教师的模式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许美德:综合大学培养教师和师范大学培养教师有着不同的优势。美国、英国等国家提倡由综合大学培养中小学教师。中国和日本等国家注重师范大学培养中小学教师。通过阅读师范大学的历史材料,我发现中国的师范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加上教育学院,其目标是培养优质教师,他们的知

识面非常广,文化水平很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在各种大学排名中,研究型大学往往被认为是最好的大学,因此很多师范大学面临着研究型大学的挑战。所以,我希望师范大学的内部结构改革不要太快,不要太受西方影响,也不要忘记自己作为师范大学的特点。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师范教育可以反映出中国的教育传统的特点。这几年我写了不少论文和著作探讨这个问题。比如我主编的《比较与国际教育导论:教师面临的问题》(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sues for Teachers)^[7]一书从社会学、历史、哲学等方面对师范大学的教师模式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该书已由西南大学的徐辉教授组织翻译。中国传统的教师教学法由于西方的影响,很多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回到中国的教育传统。西方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比较被动,强调识记,缺乏创新,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种传统,有时候识记背诵是另外一种创造。所以,中西方的教育传统差距太远,让双方去了解很不容易。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完全学习西方的教师教育,还必须结合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师范教育传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

以师范院校为例,很多讲英语的人不懂“Normal(师范)”为何物。两年前,我在华南师大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师范大学的教育问题”的讲座,其中受华南师大教务处之邀,我专门讲了师范大学的历史。其实“Normal”是法语中的一个古老词汇,有“确立一种道德标准或规范”的意思,蕴含着“高质量、高标准”的追求^[8],其概念比较接近中国传统的对于教师培养的认识:知识论是整体性的,注重道德、注重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注重实践和政治意识,比如共和国的概念、公民教育等,用引导的方式去获取知识。

我在《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比较》一文中梳理了中国与美、日、英、法的教师教育模式的差别^[9]。19世纪的法国、英国以及美国师范学院建立的是以培养教师为目的的机构,在办学使命上与“大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而在精神气质上,这些国家的师范学院倒是可以和中国的学术传统达成某种沟通。法国大革命以来,有建于1794年的高等师范学校,地方的每个大学区还有10所师范学校(5所男子师范学校,5所女子师范学校)。法国认为综合大学不适合培养教师,因为其专业性和学术性太强,而他们需要培养有整体知识面、注重师生关系、国家和学校联系紧密、国家要承担所有教学花费等的学校。美国在19世纪时曾有上百所师范院校,其中很多学生是女生,它培养了第一批国家制度的教师。后来师范院校纷纷和大学合并,师范的名字消失不见(唯一剩下的是伊利诺伊的一个镇的名字里有师范二字,这便是19世纪的伊利诺伊师范学校,该校后来并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8]。这是一件憾事,是教育的一种缺失。

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师范院校为其教育体系培训教师。二战后日本深受美国的民主化和分权化影响,改革其师范院校的教师培养系统,一些原来的师范学院合并为大学的教育学院,另一些发展为地方的教育大学。教育大学完全脱离西方传统大学的模式,又吸收师范学院的传统优势。它非常重视音乐、美学等科目和教育学、心理学,而综合大学不太重视这类课程和训练。另外,它也注重对教师道德的培养。目前,在韩国、印度等国家也建立了教育大学^[9]。

因此,我认为有时候我们需要顶住国际潮流的压力,保留自己的特色。“师范”是东方和西方的一个桥梁,西方重视学科,东方重视教育现象,两者惊人的相似之处是都保留了师范大学这个名字。师范大学需要关注自身历史和现状,重视教育,不完全按照世界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希望中国大学保留自己多元化的模式,保留自己的特色,可以了解自己的特点,从而进行发展。

如何让西方了解和接受“师范”一词?我认为,教育大学是一种可选择的发展方式。中国目前虽然还保留着师范大学的名称,但越来越学习美国的综合大学模式。如何弘扬中国师范教育的传统,把学科与教育结合起来呢?一方面要促进跨学科、多学科的学习,培养学生综合思考的习惯和

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弘扬中国师范教育的历史文化，结合中国师范教育传统的精华，发展教师培养的特色。我现在有些担心的是中国有的大学现在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忽视了自己师范的传统。师范大学这个模式的意思是把学科内容和教学理论结合起来，把学科和教育结合起来。虽然师范大学的名字还有师范，但是我们每个系，比如物理系、数学系和化学系等，把负责教学的一部分的教师分到教育学院，完全就是重新组织。总之，我认为面对这些新的挑战，师范大学应该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多一点自我的考虑。

笔者：中国现在正在推动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其中农村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对农村教师的培养国际上有没有好的经验？

许美德：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些年倡导教育公平，关注农村教育是非常正确的。不仅是中国西部地区需要发展农村教育，即使是东北、华东一些地区，也都需要发展农村教育。当然，中国的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更急需发展，在这方面西北师大做了很多工作。从比较教育的视角看，发达国家在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比如日本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教育，当然日本的农村和中国相比，规模大小也不能对等。同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面临这些问题，因此不应只参照西方发达国家，还应该更多参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此外，国际领域对此也很关注，比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中国西部地区开展了很多的基础教育的项目。

同时，农村教师的培养也很重要，各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思考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可以增加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的流动，提倡城市学校的教师到农村学校从事一定时间的教学。这样，既可以开拓其视野，又可以帮助农村学校发展，所以要创造多一些条件，多鼓励他们和当地的人和事产生感情，把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另外，对一些知识水平可能不是很高，但非常热爱农村教育的青年，应该鼓励他们到农村服务。已在农村工作的教师，从感情、阅历、服务等方面来说，他们愿意留在这里，因而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承认和鼓励他们。

笔者：从2010年起，西南大学和加拿大温莎大学合作“中加教师教育互惠学习项目”^①。双方每年派出20名左右的师范生到对方学校学习和实习。您对教师教育的互惠学习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许美德：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加拿大的温莎和中国的重庆都是重要的工业城市。要建立高校、地方教育局和中小学校伙伴关系很不容易，这个项目很好地增进了大学和中小学的联系，促进了两者的伙伴协作关系。

我一直以来致力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思考如何通过文化教育研究把中国的文明，特别是中国的教育理念介绍给世界。70—80年代社会学家分析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腾飞的原因时，发现儒家的教育观念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在“加中联合培养教育学博士”项目中，我们说服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支持中国的年轻学者来加拿大，并且希望我们加拿大的博士生也能来到中国学习。最开始他们没有同意，后来经过中方的鼎力支持，终于成功。第一批我们派了11名加拿大的博士生来到中国，学习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从那个时期开始，我就非常强调中西文化教育的相互学习。

互惠学习项目：一方面让更多的中国青年人走进加拿大、了解加拿大，让中国的师范生能把加拿大教育的一些思考和反思带过来；另一方面，让更多的加拿大青年人走进中国、了解中国。这是一个双边互动的过程，有助于中西方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对话。我在本次会议中也与参加互惠学习

^① 该项目2010年起由温莎大学“战略优先项目基金”(Strategic priority fund)资助和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基金资助。2013—2020年成为“加拿大-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项目”的一部分，已获得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委员会(SSHR)的资助。

项目的几位加拿大研究生交流,了解到了很多,也和他们说了自己的一些感受。

中国很像是一个大的教育实验场,在这二三十年发生了很多很好的变化,从外面引进的模式如何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希望教育学的各种实验不要变化太快,要好好考虑自己本身的宝贵遗产。

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受到陈时见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谨此特别致谢!

参考文献:

- [1] 许美德. 圆满:一个加拿大学者的中国情愫[M]. 周勇,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96.
- [2] Hayhoe R. The Use of Ideal Typ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 Personal Reflection[J].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07, 43(2): 189-206.
- [3] Huntington S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J]. *Foreign Affairs*, 1993, 72(3):22-29.
- [4] Hayhoe R, Pan J.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M].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1:3.
- [5] 许美德,潘乃容. 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
- [6] 许美德. 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 许洁英,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4-15.
- [7] Mundy K, Bickmore K, Hayhoe R.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sues for Teachers[M].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2008:4.
- [8] 许美德,李军. 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比较[J]. *教育研究*,2009(6):54-62.
- [9] Hayhoe R, Li J. The idea of a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21st century[J].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2010,5(1): 74-10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eacher Education

——An Interview with Dr. Ruth Hayhoe of University of Toronto

HUANG Ju^{1,2}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Windsor, Windsor, Canada N9B 3P4*)

Abstract: Dr. Ruth Hayhoe comment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he explores how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learn reciprocally and the new way of establishing global relationship i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dialogue”. Dr. Ruth Hayhoe criticizes the value free researches and turns to the researches with explicit value in the frame work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he explores the core value of culture and introduces Chinese tradition and academic spirit to the world. She traces the meaning of “normal education” and stresses that it is a bri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She proposes that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 should effectively engage with its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s, as well as develop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dialogue on civilization; teacher education; Ruth Hayhoe

责任编辑 李航